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黄瑞成 ● 主编



城邦与自然

——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

Polis & Physis

刘小枫 ● 编
柯常咏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黄瑞成 ● 主编



城邦与自然

——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

Polis & Physis

刘小枫 | 编

柯常咏 |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刘小枫编;柯常咏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5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5728-6

I. ①城… II. ①刘… ②柯…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2091号

城邦与自然

——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

刘小枫 编

柯常咏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0年5月北京第1版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8.625

字 数:230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前 322 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 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 367 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 335 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得西方学问第一集大成者之称——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载寒暑,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以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

2 城邦与自然

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
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解——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
非如此不可。

2009 年 5 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编者说明

在当今的现代性论争中,不断有学人试图拿亚里士多德学说来修补现代性构想,似乎亚里士多德哲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支援现代性观念的某些方面。显然,柏拉图很难被拉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同是西方古典哲学的基石。Aristide Tessitore 编的文集 *Aristotle and modern politics: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Uni. of Notre Dame Press, 2002) 是晚近的证明;在译成中文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和尼科尔斯的《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都不同程度地以亚里士多德来批判或修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似乎能够拉来挽救现代性,柏拉图却不能,表明这两种古典哲学具有根本性的品质差异——柏拉图的《法义》以宗法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自然为出发点,就是证明。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就提出了跟随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抉择问题,在中古阿拉伯哲学和犹太教哲学中,这样的问题仍然还在——看来,我们迄今没有摆脱这种选择。

今人可以援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来修正现代性构想,也许

表明现代性构想与亚里士多德思想可能有某种隐深的内在关联——施特劳斯已经以锐利的探究目光指出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血脉关联。尽管亚里士多德与经院亚里士多德主义并非一码事,现代性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瓜葛,毕竟不如柏拉图那样清楚、干净。

西方学界研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思想的关系大致有三种取向:要么援亚里士多德来修补现代性观念,要么辨明作为古典哲人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现代性思想从根本上讲不可通约,再就是追究亚里士多德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兴起应负的责任——无论哪种途径,当然都得首先搞清楚亚里士多德思想(尤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诸多细节,而且值得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思想差异入手。笔者平时读书随手蒐集了若干西方学界晚近的相关文献,适逢同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柯常咏同志欣然承译,便结集成书——国内学界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迄今仍然主要着力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编、译者企望本文集能为学界研究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与现代性论题相关的论题积累点滴汉译文献。

文集的编成,亦得陕西师范大学古希腊-罗马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黄瑞成同志相助,谨致谢忱。

刘小枫

2009年11月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编者说明	1
彻丽 外侨与异乡人	1
马尼凯尔 道德性情:品性、习性和“习惯”	32
亚科 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54
阿莫伯勒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自然性的理解	83
内德门 政治动物之谜	109
尼柯尔斯 美好生活、奴隶制与获得物	134
盖拉 亚里士多德论快乐与政治哲学	151
考克斯 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论慷慨	167
林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代性	193
伯恩斯 亚里士多德与现代人论自由与平等	200
普吕弗 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施特劳斯对勘	222
马树基 政治哲学中的公与私	231
附录	
夏普雷斯 亚里士多德的外传作品和内传作品:概要与述评 ...	237
张伯伦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称伦理学为 Ethics	250

外侨与异乡人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实践政治学的批判

[博士论文提要]

彻丽 (Kevin Cherry) 著 柯常咏 译

“亚里士多德……写作《政治学》似乎只是为了克制他对柏拉图的感情”。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卷一,第8章

施特劳斯(1987^①)在他论柏拉图的文章开篇不久即指出:“所有柏拉图的对话,多多少少都直接涉及政治问题,但从篇名上看,其中只有三篇专谈政治哲学:即《王制》、《治邦者》和《法义》”(页33)。三篇对话中,都主要由一位不同的哲学发言人提出论证:苏格拉底、埃利亚异乡人和雅典异乡人。这不是什么新奇之见;许多注家都已注意到这一点。

但人们较少谈到的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依次回应了上述哲学发言人的见解。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结尾,亚里士多德已经制定了《政治学》将遵循的方法:任何对善法的研究,都要求研究者熟悉各种曾经据说是善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还告诉我们,其中的第一步,便是“全盘考察被我们的众前辈所称善的法律”(1181b16-17)。

① [译注]见附录参考文献。

尽管如此,许多注家却没有注意到《政治学》卷一与亚里士多德方法的关联。^① 亚里士多德对埃利亚异乡人的批判——后者论及政治统治者、王者、家长和奴隶主的同一——几乎没人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了,也很少予以强调。^② 此外,亚里士多德对埃利亚异乡人的批判在《政治学》的其他章节仍有继续,甚至可能贯穿了整个《政治学》(最明确的批评表现在讨论政制的部分)。但是,如果研究者没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对埃利亚异乡人的关注,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仍将隐而不显。^③

较多注家知道,在《政治学》卷二中,亚里士多德批判《法义》中的雅典异乡人。亚里士多德先以长篇大论考虑《王制》中苏格拉底的提案,转而“简要”考虑柏拉图的克里特殖民地的政制(1264b28)。然而,这部分文本的论述非常简练,研究者必须继续检审在《政治学》中有哪些地方,亚里士多德或明指或暗涉《法义》中的提案,并且往往是(如 Kraut 指出的,2002)借用这些提案来建立他自己的城邦。

本稿拟考察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两个不太著名的哲学发言人的批评,即《法义》中的雅典异乡人和《治邦者》中的埃利亚异乡人。我认为,基于两个理由,我这么做是正当的。首先,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王制》中苏格拉底的批判已经有太多人写到。的确,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基本上就等于他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对《王制》的批判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其中所给出的提案不可能实现(参 Stalley,1983)。为了弄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可能的方

① Newman, 1950; Barke, 1959; Voegelin, 1985; Mayhew, 1997; Rackham 1999; Kraut, 2002。

② 这一点可能指的是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3.4),但还有一个原则,即统治者由知识规定,则只在《治邦者》中见到。

③ 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到柏拉图,而是提到“那些”认为王者、政治统治者、家长以及奴隶主都是一样的人。Morrow 指出,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到柏拉图时惯常使用的方式(1960a,82)。

案是怎样的——还有,两人在何处及为什么会在下列经久不衰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诸如实践政治引起派系之争的问题,混合政制的性质和制度的问题,法治的优势与局限的问题,以及哲学在教育公民中的角色问题——我们需要看一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另外两个哲学发言人的论证的综合批判。通过考察柏拉图的实践政治学,我们也就更多了解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实践政治学。

很明显,这一努力有赖于如下想法,即每个发言人都有着某些不同,而不仅仅是为同一观点辩护的不同代言人。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使我的任务变得复杂:大部分注家读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他把雅典异乡人等同于苏格拉底(《政治学》,1265a13),但现在讨论的这段文本不必以这种方式阅读。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的言辞或思想很有感染力,但要做到处处都美丽或高贵却很困难(参 Simpson, 1998, 页 93)。我们无须由此推断雅典异乡人就是苏格拉底,尤其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之前刚刚不仅批判了《法义》,也批判了《王制》。此外,也不能把亚里士多德视为完全无误的向导,因为他在考察柏拉图的各种不同提案时,偶尔也会犯错。例如,他批判雅典异乡人没有控制邦民的数量(1265a39),但后者恰恰控制了邦民数(参 740a-e)。^①的确,西塞罗——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他必定比我们了解得更多——表示,他相信雅典异乡人不仅代表苏格拉底,也代表柏拉图(《法律篇》,1.4)。

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整个 20 世纪,上述两个哲学发言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已经得到了强调。年代学或发展学派认为,要理解各种不同的苏格拉底立场之间的张力,其途径就是假定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① 难道亚里士多德的这篇讨论多数时候都是用反讽?他批判苏格拉底浪费大量时间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统治者的教育问题;但他自己也告诫说,恰恰这方面的失败构成了所有现存城邦的缺陷,因此他也亲自针对教育问题开出详尽的处方。

以及形而上学思想中有一种“发展”。^① 这也就是说,被认作写于早期的对话(例如《申辩》),代表着柏拉图还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之下;而后来的对话则显示出他与老师的决裂。非苏格拉底的对话又被分成中期对话和晚期对话,前者如《王制》,在其中柏拉图觉得自己仍可借用苏格拉底做他的“代言人”;后者如《治邦者》,在其中,相信柏拉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师分道扬镳,以至于他感到不适合再把苏格拉底做他的代言人,于是就隐藏在埃利亚异乡人的伪装之下。据说,《法义》是柏拉图写作的最后一篇对话,他去世时这篇对话还留在蜡版上(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37),因此,雅典异乡人据说代表着柏拉图在政治事务上的临终之言。

起初,这一观点曾在主题分析的基础上被认为合理,但就连拥护它的人也被迫放弃了这种主观色彩的努力(Brandwood 见 Kraut, 1992, 页 90-91)。虽然如此,布兰伍德(Brandwood)却在《剑桥柏拉图指南》(Kraut, 1992)里面的论文中没有任何引证或论证,一开篇就断言,

要想正确理解柏拉图,就必须考虑如下事实,即柏拉图的哲学活动持续了大约五十年,在此期间,他的某些学说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关键是要知道这些对话写作的顺序,但在这方面,无论是外部资源还是对话本身都没有提供什么帮助。(页 90)^②

尽管“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还是有学者尝试借助文体分析——从拉尔修的资料看来,上已提及——来确定哪些对话在写作上与《法

^① 亦参 Klosko(1986), Saunders in Kraut (1992), Kahn (1995), 和 Bobonich (2002)。就连 A. E. Taylor(1960)也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从 Voegelin 那里也可以找到这种方法的痕迹。

^② 在对相关文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之后, Thesleff 宣称,“如同传统已经实践过的那样”,文体学“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可疑”(1982, iii)。

义》最为相似。这种分析的最终结果,乃是像拉纳(1998)那样的立场:她告诉读者,她将不考虑“苏格拉底与埃利亚异乡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大胆地把埃利亚异乡人的论证等同于柏拉图的论证”(页8)。

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理论充满了复杂因素。首先,没有理由假定,即便我们知道了柏拉图写作各篇对话的顺序,就一定比从对话内部本身揭示出来的顺序所提供的解释更好;布兰伍德的叹息(前揭,页2)还是一样深长。此外,郝岚(Howland,1991)详细证明了文体分析本身也依赖于可疑的前提。柏拉图经常改写他对话中的某些部分,而且,关于这些对话的写作年代,我们的外部证据亦不充分。最后,尤其是就《法义》和《治邦者》而论,应该注意到,一个天赋如柏拉图这样的作家,如果要创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戏剧人物,当然会改变他通常的写作风格。年老的雅典人说起话来可能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从埃利亚来的异乡人当然也跟雅典人和苏格拉底都不一样。库珀(Cooper,1997)在柏拉图全集的导言部分结束他的年代学讨论时,敦促“读者在从事柏拉图作品研究时,不可固守传统上‘早期’、‘中期’、‘晚期’对话的年代学分组。只有六篇对话可以可靠地确认为晚期作品。但即便对于这些作品,也最好把年代上的考虑放在其该有的次要位置上,当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品的文学和哲学内容,关注这些作品本身及其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xiv)。

然而,关于柏拉图主题发展的说法也有可取之处:柏拉图的不同哲学发言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政治生活观。事实上,马斯特斯(Masters,1997)发现,苏格拉底和埃利亚异乡人之间的差别实在太,以至他提出《智术师》和《治邦者》的作者是亚里士多德。然而,正如有些人追问柏拉图发言人在观念上的发展变化一样,还有些人则强调柏拉图的不同发言人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肖里(Shorey,1965)断言,雅典异乡人提供了一条接近《王制》中的政制的可选思路,《治邦者》则进一步对同一教导进行了详细说明(页265)。施特

劳斯(1987)主张,《治邦者》“可以说是将《王制》中隐而未说的内容公之于众”(页72),而《法义》则提出“城邦的最佳秩序”,这种秩序与其他两篇对话中揭示出来的政治的局限性一致(页78)。罗森(1995)强调:“异乡人的政治学说与《王制》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或《法义》中雅典异乡人的观点鲜有差异”(页7,参viii, ix, 2, 8, 184, 188)。米勒(Miller, 2004)则颇为有趣地表示:恰如奥德修斯隐藏自己的身份返回家园,异乡人也可能“代表着苏格拉底戴着面具出场”,其目的在于“使苏格拉底的哲学得以揭示自身之所是”(页13)。^①也就是说,当异乡人辨认出智术师、治邦者和哲人三者各自的身份,柏拉图的三个哲学发言人方合而为一。

然而,本稿持如下观点:就像试图去除污渍一样,不能对柏拉图的三位哲学发言人做简化处理。这并不依赖于年代学或主题发展的外在考虑,而是源于两个更为省力的观察。首先是一个简单的戏剧事实:柏拉图选择三个不同的哲学发言人出场,一个思想天才这样做,肯定有其理由。其次,对话中,发言人之间明显存在真实而重大的差异。不像年代学派所用的方法,我并不想对柏拉图的对话进行合理的排序,但我会适当的时候注意并强调上述差异。其实,亚里士多德依次提到三个发言人并予以反驳——至少试图去反驳——本身就表示他们之间存在不同看法。

我并不是说三个发言人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强调城邦内部的派系之争问题——这个问题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由此应可推断,柏拉图本人也把派系之争视为一个问题。然而,就连这种相似性也表明了差异。因为,虽然诸发言人同意派系之争是一个问题,但恰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以及应当如何解决问

^① 米勒提出,“《治邦者》中的埃利亚异乡人是柏拉图的虚构”,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看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他对柏拉图对话者的看法——他们是“当时各方面文化的解释性代表”——扩大到埃利亚异乡人自己身上(xviii)。

题成了他们彼此分歧的焦点,而且分歧还很重大。

我的研究一方面尝试填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研究上一个相当大的学术空白——几乎无人论及亚里士多德对《法义》的批判,而他对《治邦者》的批判更是少人问津——一方面也是针对当代的一些论争。或许比起苏格拉底而言,雅典人和埃利亚异乡人提出了更多涉及当代论争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批判往往也正是指向这些问题。例如,雅典人提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埃利亚人则提出了政治与自然、政治与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文学界,即广义上的“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把亚里士多德视为对现代自由主义的矫正。^①此外,美国现行外交政策——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可能都被其输出法治的意图所规定,其中每个有待检审的立场都与这一基本主题有关系。或许有些自相矛盾,但对于《治邦者》和《法义》而言,我们必须注意——恰如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已做的那样——去发现更多柏拉图关于政治实践的提案。就像许多注家(例如施特劳斯,1964)已经论证过的那样,《王制》根本不是代表一种实践理想,而是代表着政治的限度(参 592b);为了阐明柏拉图关于政治实践的思想,要求考虑他的上述其他对话。

本稿首先将讨论柏拉图的哲学发言人问题。显然,这一主题可能、或许也应该给出更多的理由。然而,我希望至少能给出几条理由——很大程度上建立于前面提到的库珀的建议(1997)——以替我所采取的方法辩护。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即仅仅把哲学发言人的立场提出来,而并不试图确定诸发言人之间的确切关系以及他们与柏拉图本人的确切关系。我也认为存在大

^① 参 Bellah (1996), Beiner (1983), Galston (1980), MacIntyre (1984), Nussbaum (1990), Sandel (1982), Schwarzenbach (1996), 和 Smith (2001)。对于如此诠释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参 Bickford (1996), Newell (1987), 和 Yack (1993)。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且可能看似更有道理的选择,参 Nederman (1992)。